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临夏地方党史简编



中共临夏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临夏地方党史简编

中共临夏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解放前的临夏		(4)
第一节 社会经济状况		(5)
第二节 苦难深重的各族人民		(7)
第二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临夏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12)
第一节 马列主义在临夏的早期传播		(13)
第二节 临夏第一个地下党组织——中共导河 特别支部		(15)
第三章 “二战”和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临夏的深远 影响		(22)
第一节 黑暗统治下诞生的红色政权		(22)
第二节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临夏青年		(27)

第三节 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甘南民变”……(29)

第四节 “二战”和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临夏籍青年……………(34)

第四章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临夏地下党组织……………(41)

第一节 党在陇右地区工作的新开端……………(42)

第二节 临夏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及主要活动……………(45)

第三节 为党的事业壮烈牺牲的地下党员……………(54)

第四节 迎接解放，建立人民政权……………(59)

后 记……………(68)

大事记……………(70)

编辑说明……………(72)

前 言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八年漫长的岁月中，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外革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缔造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进行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了成百万优秀共产党员，终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而，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少数剥削者统治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使我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劳动人民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新时代。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北边陲之地——临夏的共产党员和有志之士，为了临夏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出了光辉的革命篇章。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临夏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并成立了革命青年的

进步组织——临夏青年社。从此开始在黑暗统治的临夏传播马列主义，开展群众工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十多名临夏籍青年投奔光明，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有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随军进行了闻名于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途经康乐县景古地区，帮助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红军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和其它一些因素，临夏地区虽然没有党组织的活动，但各族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和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一直此起彼伏。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临夏地下党组织各族人民在反蒋反特，抗粮抗款，反对抓兵等方面进行了英勇斗争，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临夏地下党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革命斗争史。临夏地下党组织领导临夏各族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进行了长期地、英勇地斗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党外志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和事迹将永驻临夏各族人民心中。

《中共临夏地方党史简编》集中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临夏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反映了广大党员艰苦奋斗的战斗历程；同时也简略地介绍了临夏籍在外地入党的地下党员的情况。

总结过去，是为了今天。我们编写这本书稿，其目的是为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中，

提供历史资料，使人们从中受到启迪，得到教益。从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励精图治，勤奋努力，为加速临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而努力奋斗！

第一章 解放前的临夏

临夏位于甘肃中部地区，东临定西地区，西接青海，南接甘南，北靠兰州。境内山峦叠嶂，群峰锁护，积石山高耸，大夏河横贯。自秦汉以来，临夏曾设县、置州、建郡。辛亥革命以后的三十多年中，临夏行政区划曾几度变更。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北洋政府改河州为导河县。民国七年改总兵为镇守使。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改导河县为临夏县。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在临夏设置临夏督察专员公署，辖永靖、临夏、和政、宁定四县。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四年）改为甘肃省第五区督察专员公署，置专员兼保安司令，仍辖上述四县。一九四九年八月临夏解放，九月成立临夏专员公署，辖临夏、永靖、宁定、康乐、和政、临洮、洮沙及夏河县。年底，增辖临潭县。嗣后，夏河、临潭，临洮、洮沙分别划归甘南和定西专区。

解放前，临夏总面积一万三千二百多平方公里，耕地约二百六十万亩。有汉、回、东乡、保、撒、藏、土等民族，共有人口八十七万四千多人。由于茶马互市和军阀割据等种种历史原因，临夏成为近代西北历史上一个很有名气的地方。解放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了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宗教三权并存的复杂局面。三种权势

共同奴役和荼毒各族劳苦百姓，造成政治上的相互依附，经济上的封闭落后，致使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处于啼饥号寒的悲惨境地。

第一节 社会经济状况

解放前的临夏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马家家族统治长达二、三十年之久。这里不仅是权倾西北“三马”的故里，而且成为军阀、官僚、地主的派生地。民国以后，先后出了省长七人、军长九人，师、旅长三十多人，厅长、县长更是数以百计。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临夏地区豪门大族毗邻相望，达官显贵盛极一时。这些军阀、官僚、地主既在政治上依附于蒋、马势力，直接操纵着地方政权，同时也是财经、宗教的控制者，军政官商融为一体。他们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相互依靠，互相庇护。往往有持无恐地霸人田产，占人妻女，包揽讼词，敲诈勒索，为所欲为。致使临夏地区的土地封建性集中，生产资料少数人垄断，工商业萧条，整个社会经济长期陷于落后状态。

（一）土地的封建性集中。临夏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量土地年复一年地被兼并、侵占。只占总人口百分之二点四六的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六十四点八，而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二点七的贫苦农民仅占百分之七点六的土地。原临夏县西川，占人口百分之三的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七十以上。乱藏乡的八百多农

户，竟没有一亩土地，全是地主的佃户。在回民聚居的八坊王寺街只占人口百分之三的官僚、地主，却占有土地八千七百多亩。漠泥沟的八十六户地主，占有五万多亩耕地，户均近六百亩，并拥有房客三百余户，长工二百八十多人，丫环二百五十余人，女工达千余人。马步芳、马步青弟兄仅占川水良田就达三万八千多亩。

（二）生产资料的垄断。解放前，临夏地区的油坊、水磨、山林、牧场及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和集市、店铺均被“三马”家族及其官僚、地主所垄断。马麟一家在原临夏县一地就占有两集（居家集、吹麻滩集）的全部街道店铺，三坪（老虎坪、香水坪、肖红坪），七寺（毗藏寺、山场寺、金场寺、红崖寺、东坪寺、张家寺、吴坪寺）等地的森林两千余亩，牧场两处，还拥有油坊三座，水磨十四盘。马步青一人就占据森林三处，水磨四十六盘，店栈二十处，铺面五百余间，还有蝴蝶楼、东公馆两处庄院。

（三）封建性浓厚。临夏地区除汉族及藏、土等民族中的一少部分信仰佛教、道教，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外，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全部信仰伊斯兰教。自伊斯兰教传入西北后，临夏一直是西北伊斯兰教发展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在临夏的伊斯兰教中，有老教、新教、新新教三派。老教中又有四大门宦之别，共有大小教派门宦二十多种。历代统治阶级，尤其是马步芳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千方百计染指宗教，操纵教权，不断制造和扩大民

族矛盾，极力把反动政权同宗教特权合为一体。浓厚的封建性，使临夏社会更加封闭、落后。

（四）**工商业萧条**。解放前，临夏的工商业一直未能得到发展。地方工业只有一个手工操作的火柴厂。商业基础也十分脆弱，商业性的手工业门类不多，生产冷落。主要有铁匠、木匠、石匠、鞋匠、毡匠、皮匠等几种。多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工具简单落后，生产效率低下。集市贸易和市场基本上被“三马”家族及官僚、地主依靠其政治、军事上的特权所垄断。在临夏县城仅马步青、马步芳兄弟先后开设了“勤萍茂”、“德兴海”、“步云祥”、“新兴”等数家商号，鲁大昌设有“德昌”商行。这些商号沆瀣一气、欺行霸市，排挤中小商人，在解放前的三四年间，竟迫使七十多家、占民族商业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小本商户倒闭停业。

第二节 苦难深重的各族人民

由于土地的封建性集中和生产资料的垄断，临夏各族人民在国民党统治的三十多年中，处于贫困、破产的悲惨境地，生活在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三种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重压之下。

地租剥削。地租剥削的形式大体上有两种：即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在实物地租中又有“死租”、“活租”之分。不论“死租”或“活租”剥削，每亩土地的租额都占

到每亩地实际产量的一半以上。另外，地主用“加二”、“加三”或大于“加三”的“卧牛升”收租，对佃农进行额外剥削。在收租时往往无端勒索、敲诈佃农，甚至有的还遭到严刑拷打或被赶走，逼得佃农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官僚、地主不仅通过地租形式残酷压榨和剥削农民，繁重的无偿劳役更使农民苦不堪言。马麟、马步青等在临夏修建的楼堂馆所无处不渗透着农民的血和泪。

高利贷剥削。解放前，临夏的高利贷名目繁多，有月利“加大一”、“黑驴打滚”、“死字活说”、“狗撵兔”、“鸡上架”、“挖鼻子”、“加一先扣”等十多种。其共同点是，借贷期短，利率高。如西川聂家村农民马四借了地主的一百块白洋，不到一年就滚到五百块。韩家集农民豆哈克木借地主的六十块白洋，三年内还了一百八十块，还欠六十元。和政县农民杨占魁借贷地主的二十八块白洋，不到一年竟翻到三百五十元，杨以全部家产偿还都未能付清。因还不清债务，一些农民便沦为官僚、地主半奴隶式的房客、长工或丫环，备受折磨。

苛捐杂税的剥削。据调查统计，临夏在解放前的苛捐杂税，名目累计多达一千七百多种，榨取人民血汗约为四百亿元。农民除负担农业税外，还要缴纳军事建设费、粮秣费、麸料费、给养费、鞋袜费、保甲费、临时费、招待费、出差费、修路款、烟筒款、兵款、马款、运输款等；有的地方还征收青苗款、大麻款，等等。地方官僚、地主

乘机横征暴敛，巧夺豪取。甚至相互勾结，转嫁负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副官、管家之类在催要粮款时，也乘机敲诈勒索。打了人要“打人钱”，捆了人要“捆人钱”，解开绳索还要“解绳钱”。

拔兵是临夏各族人民遭受的又一沉重灾难。马家军阀把临夏作为其兵源的主要地区之一，频繁地强征大批青壮年入伍当兵。规定“五丁抽一”、“三丁抽一”、“二丁抽一”，直至强抓独丁。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两年，马步芳在临夏大规模征兵五次，抓去青壮年男子三万八千多人。在只有人口八万六千多人的宁定县（广河县）仅一九四九年一年中就抓走青壮年七千六百五十四人。在原临夏县，将八坊各小学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基本全部被抓当兵。有的青年为了逃兵，忍痛砍断食指；有的戳伤眼睛，致成伤残；有的长时间的藏在洋芋窖里致使双目失明……。拔兵使数以千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正如在一首花儿中唱的：“马步芳抓兵在河州城，活象似吃人的阎君；满城不见个青年人，都当了可怜的新兵。”

蒋、马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还对各族人民采取惨无人道的高压手段。官僚、地主私设公堂，滥施刑罚，用“鸭子浮水”、“揭背花”、“砸骨骼”、“点天灯”、“炼油”、“抱火筒”等残不忍睹的酷刑来折磨、残害农民，使许多无辜善良的贫民百姓惨遭非命。

在高额地租、无偿劳役和高利贷等的苛刻剥削之下，

广大农民纷纷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多沦为佃户、长工。“大人冬天无棉裤，小孩四季光屁股”更是常见的事情，甚至十三四岁的姑娘没有衣裳遮身。漠泥沟有一户农民，夫妻二人共有一条裤，男人出外，女人只得坐守在炕上。大多数农户炕上无铺盖，只有一领草席。各族人民在这种贫困、破产、饥饿与死亡的厄运威胁之下，有的逃往异乡，寻求生路；有的世代为地主做牛做马，过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生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剥削愈甚，反抗愈烈。临夏各族人民并不甘心忍受蒋、马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不断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一九四〇年，东乡汪百户群众为反对马步芳干涉教派内部事务刺杀了其亲信、临夏专员兼保安司令马为良；一九四三年，康乐县回民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和吕百元，以及东乡族农民马木哥，串连当地群众揭竿而起，和王仲甲、肋巴佛等人共同发起“甘南农民起义”。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反，免粮免款”的口号，起义烈火席卷甘肃二十多个县，历时七个多月；一九四六年，和政县赵家坡佃户赵西林、赵得春等六人，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剥削，杀死马步芳部旅长马得胜的胞弟马尕三；同年，大河家保安族群众奋起痛打强占水渠的恶霸地主马廷瑚；一九四九年，临夏县城群众为抗兵抗款捣毁了镇公所，围打了镇长张一新。

上述反抗斗争，虽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

有党的领导，都是群众自发性的，但充分反映了蕴藏在临夏各族人民中的反抗反动统治和变革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这就为临夏地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两次建立党的地下组织提供了条件，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第二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临夏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所进行的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与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合作，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了革命军队，参加了统一广东的革命战争和北伐战争，发动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的工农运动和人民解放斗争。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但它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批中国共产党员先后进入甘肃。一九二五年冬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成立。从此，党在甘肃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随之，党在黑暗笼罩的临夏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中共导河特别支部。中共

导河特别支部建立后，在临夏传播马列主义，进行群众工作，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第一节 马列主义在临夏的早期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十年代中期，临夏籍进步青年胡廷珍就开始了他在家乡的革命活动，成为马列主义在临夏的最早传播者之一。

胡廷珍 字玉芝，一九〇二年生于临夏城内一个经营农商的殷实家庭。一九一九年考入兰州法政学校。在读书期间，因带头抗议新任校长停发学生助学金，引起学潮，被学校以整顿校纪为由无理开除。一九二一年到北京，进入北平朝阳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和一些甘肃籍学生一道积极参加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革命斗争活动，使胡廷珍得到锻炼，并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一九二四年胡廷珍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①一九二六年党派他到广东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同年底，党又派他到西安国民联军政治部工作。

胡廷珍入党后，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为党的事业奔走呼号。一九二四年，他利用暑假回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联络、组织进行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引导青年走革命之路。他向同学、亲友分送《三民主义》、《五权宪

^① 一说在一九二三年入党。